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

孙 江

内容提要 皮埃尔·诺拉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陆续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文节译本导读,本文在梳理了该书编纂的前因后果后,介绍了收录于中译本中的11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指出诺拉继袭了哈布瓦赫以来将历史与记忆区隔的传统,因此招致了主张历史即记忆的保罗·利科等之批评。

关键词 记忆之场 象征 年鉴学派 皮埃尔·诺拉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历史在加速)。^①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导言中劈头如是说。基于这种当下的紧张感,从1980年代中叶开始,诺拉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3卷7本、超过5600页的煌煌巨制。与以往强调对过去发生之事进行考索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性史”研究亦径庭有别,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②

1931年11月17日,诺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下,作为犹太裔法国人,诺拉家族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惊险。战后,诺拉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读书,最后在索邦大学(Sorbonne)取得大学学位。1958年,诺拉赴法属殖民

地阿尔及利亚 Lycée Lamoricière 学校任教,1960年返回法国,翌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书,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与作为“内地人”(Métropole)的法国人之不同,^③该书经常被作为学术著作来引用,其实它只是诺拉个人的观察记录,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学著作。^④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谋得教职。这期间的诺拉,与其说是教授,不如说是编辑;与其说是学者,毋宁说是记者。1964年,他在Julliard出版社创办“档案丛书”。1965年成为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编辑,先后创办“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书”、“历史学丛书”等。1980年,又与哲学家戈谢(Marcel Gauchet)创办《论争》(Le Débat)杂志,引领法国知识界的前沿话题。在诺拉主编的丛书中,收录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项目号:13&ZD191)的阶段性成果。

的著作。1974年,热衷于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三卷本《创作历史》(Faire de l'histoire)。^⑤上述学术组织活动为其日后延揽120名作者进行“记忆之场”研究构筑了必不可少的人脉关系。

转机来临。1978年诺拉在堪称“年鉴学派”大本营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其时,法国历史学界正经历回归政治史研究、重新评价叙事史的新趋势。2002年,诺拉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其主编的《重新思考法国》第一卷导言中,直言1960-1970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史学是对“事件史的十字军”,^⑥而1970年代兴起的“心性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不过是那种“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未必反映质的变化。诺拉呼吁关注被历史学者忘却的当下的“历史”——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生造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叶兹(F. Yates)在《记忆术》一书中曾谈及拉丁语中的loci memoriae。^⑦loci是locus的属格,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显然,诺拉的“记忆之场”要比该词的原始意义宽泛得多。1984年《记忆之场》第一部“共和国”(la république)一卷出版,该卷从第三共和国开始,分象征、纪念物、教育、纪念仪式和对抗的记忆等五个主题,选择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场所和事例。1986年第二部“民族”(la nation)三卷出版。^⑧第一卷“遗产、历史叙述、风景”(héritage, historiographie, paysages)偏重于“非物质性”内容;第二卷着力于物质层面——“领土、国家、文化遗产”(le territoire, l'état, le patrimoine),既有国境、六角形象征,也有凡尔赛宫等记忆装置,还有历史遗产及其保护运动等;第三卷“光荣·言语”(la gloire, les mots)与理念有关,分别考察了军事上的荣耀和市民荣誉、言语与文学、以及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事物。1992年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三卷出版。在第三部,“记忆之场”概念有所扩大。第一卷“对立与分有”(conflits et partages),围绕政治独立、宗教少数群体、空间和时间的分割(海岸线、巴黎与地方、中央与周边等)而展开;第二卷“传统”(traditions)包括反映“法国传

统”的钟楼、宫廷、官僚、职业和《法语史》等,还有地方性文化、法兰西个性等;第三卷“从古文到象征”(de l'archive à l'emblème),涉及书写、名胜和认同等。

《记忆之场》是关于记忆叙事的百货店,既有旁征博引的长篇论文,也有寥寥数页的随笔;既有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勒高夫、拉杜里、夏利埃(Roger Chartier)等名家,更多的是不知名的作者。1996-1998年,在诺拉本人的参与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从原著中精选44篇,编为3大册,以英译名Realms of Memory出版。^⑨2002年,日本岩波书店选取其中31篇,编译为三册出版。^⑩其间,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也先后出版了不同节译,而仿照《记忆之场》的各种研究更是不断出现。

在历史学发达、名家林立的法国,尚未出版过一本专著,诺拉一跃而为众目所矚。^⑪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罗贝尔法语大辞典》(de Grand dictionnaire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收入Lieux de mémoire。2001年6月7日,诺拉被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国Académie française会员(列第27位)。《记忆之场》一书成为诺拉本人的“记忆之场”。

2009年,我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持跨学科研究计划“南京:现代中国记忆之场”时,即已着手《记忆之场》的翻译。一如美国和日本的译本各取所需,我们根据自身的需要,选取了其中29篇论文和版权方伽利玛出版社交涉,很快得到善意的回复。诺拉本人也很高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记忆之场》引起的关注。翻译是件苦差事,“所有的翻译,在与原作的意义层面的关系都是片断”。^⑫我决定一边交涉版权,一边组织译者分头翻译。半年后,伽利玛出版社突然来函,先是质疑译者水平,继而又质疑我们计划的可行性,结果我们只得到11篇论文的授权,其间的故事和曲折,业已成为我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之场”。

我们将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分为三组:“记忆与纪念”、“记忆与象征”和“记忆与叙事”。如此划分完全出于阅读之便。“记忆与象征”收录《七月十四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记忆与叙事”收录《自由·平等·博爱》、《贞德》、《拉维斯〈法国史〉》和《普鲁斯

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记忆与纪念”收录主编诺拉所写的导言或结语，《在记忆与历史之间》（1984年）系第一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1992年）为第三部第一卷导言，《纪念的时代》（1992年）附于第三部第三卷末，相当于全书的结语。鉴于在第二部三卷中，诺拉只留下一篇简短的《民族与记忆》的结语性文字，^⑬这三篇文章应该是理解编者意图的最重要的文字

二

Aujourd' hui rien(今日无事)。

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这天夜里巴士底狱发生的暴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将其送上了断头台。“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对某些时刻而言，光辉的记忆理所当然”（Victor Hugo）。1880年，7月14日被确立为法国国庆日。吊诡的是，巴士底狱并非被攻陷，狱中关押的仅七名犯人亦未受到一般意义上的虐待。在《七月十四日》一文中，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Christian Amalyi）爬梳了7月14日如何从右派眼中的“狂暴之日”到全法国人的“庆典之日”的过程，恰如作者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我们今天经历的国庆节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

1792年4月20日，革命的法国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宣战，4月25日至26日之间，工兵上尉约瑟夫·卢日·德里尔（Rouget de Lisle）在斯特拉斯堡谱写了一曲激励战士的《莱茵军团战歌》，这就是1879年2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和7月14日一样，关于马赛曲的争议亦从未停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考察了围绕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史，最后他发问道：“今天谁还记得、谁还能唱起过去在学校里学会的那三段歌词中的第一段——且不要说全部三段了”。

围绕7月14日和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和解似乎应验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纪念历史”的断语：“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⑭相比之

下，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纠结。1889年，正当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为迎接博览会而建的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这座让附近的巴黎圣母院钟楼黯然失色的铁塔，在虔敬的教权主义者眼中是“渎神”的象征，而共和主义者则赋予铁塔复仇的意蕴，念念不忘“普法战争”败北屈辱的德莱扬（A. Delayen）有诗道：“屈服吧，德国佬/看看这举世无双的奇迹”。铁塔建成20年后，承包人埃菲尔收回经济效益，将铁塔所有权交付给巴黎市政府，但他的名字和铁塔一起成为巴黎的标志。亨利·卢瓦雷特（Henri Loyrette）的《埃菲尔铁塔》让读者认识了埃菲尔铁塔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角色。

1903年7月的一个晚上，《汽车报》（L'Auto）主编德格朗热（Desgrange）为了与其他体育报一争高下，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想出了举办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普通的体育运动后来演变为法国人生活中的重要节日，成为“国家的财产”、“民族遗产”。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的《环法自行车赛》以百年为经，探讨了环法记忆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制度，并最终成为每个时代法国人的记忆之场的。了解法国史的读者知道，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很少居住在巴黎，经年累月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有效性。让路易十四黯然的是，德格朗热所创意的环法自行车赛仅用“游戏”即整合了国家，把国土空间（espace - nation）搬上舞台，把领土当作布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

上述记忆之场均源于一个偶发事件，事后被分别赋予了社会政治意义。对历史客观性持怀疑态度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康德与席勒》（Kant and Schiller）一文中写道，历史没有所谓进步与倒退之分，应该将历史视为一个事件（event）、一次出现（occurrence），“只有当权力（power）和战斗（battle）等词语出现时才会有历史。在那个瞬间，因为发生（happen）各种事情，于是有了出现，有了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的概念，与时间毫无关系，仅仅是从认识言语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语言”。^⑮如果把这里的认识语言置换为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社会政治

事件的“痕迹”的话,似乎可以有保留的加以接受。不是吗?虽然事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所知晓的东西,从事件的因果链中无法说明事件的本质,但通过对事件留下“痕迹”的爬梳依然可以辨析其语义学(semantik)价值。^⑩拉维斯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分别汇集事件“痕迹”,建构起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目中的法兰西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催生了欧洲大陆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诞生又催生了以“民族史学”为旨归的近代历史学的诞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为民族史学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工具。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既互相敌视,又相互学习的邻邦。19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法国史学泰斗的拉维斯(Ernest Lavisse)和莫诺(Gabriel Monod)都曾留学德国。可以说,如果没有兰克史学,很难想象会有拉维斯的《法国史》。《记忆之场》主编诺拉亲自执笔写作《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表面上似乎要解构拉维斯所建构的法国民族史,而从其将米什莱(Jules Michele)、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法国史学三巨匠置于史学史谱系上加以比较可知,他意欲以“记忆之场”建构一个新法国史。因此,诺拉关心的不是拉维斯写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写。拉维斯与其前辈米什莱关注民族国家的时间等级——法兰西起源不同,关心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空间等级——路易十四以来的法兰西轮廓,诺拉认为在卷帙浩繁的27卷《法国史》中只有《法兰西地理图景》和拉维斯执笔的两卷《路易十四》“代表了民族认同最强烈的时刻”。“拉维斯的27卷《法国史》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源源不断出现的法国史书,并成为记忆的场所,是因为其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这27卷《法国史》就像一个大熔炉,其中两个真理短暂地交融在了一起。这两个真理在今天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在当时却是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那便是档案的普遍真理性以及民族的特殊真理性”。拉维斯“确立了法兰西鲜明的形象,并最终悬起一面明镜,在这面镜子中,法国不断地重新认识着自己”。

如果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长篇小说

《追忆似水年华》和拉维斯的《法国史》作比较,看似唐突,但并非没有道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个叙述已发生的事,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⑪确实,拉维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撰述法兰西民族历史,普鲁斯特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一个个法兰西人——上流休闲社会的历史,拉维斯的《法国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业已定格在过去的时空中,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仍然活在当代法国人乃至其他国家读者的心中。在法国,上至共和国总统,下到一般国民,“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人读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想要写作,小说就有幸成为指引我们的北极星,或是使我们迷失的捕鸟镜”。现在,关于普鲁斯特的书籍已超过了2千本,普鲁斯特是如此有名,书可以不通读——很少有人通读!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所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不妨一读,跟着作者优美的笔触,读者可以追寻法国历史上的似水年华。

过去不在,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自由”、“平等”、“博爱”三字箴言作为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名词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然而,正如莫娜·奥祖芙(Mona Ozouf)在《自由·平等·博爱》一文所指出的,“我们更注重其象征意义而非其内涵的价值”,在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多年后,“只有通过这三个疲乏术语的单调的诵唱,这句箴言才有机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生存下来”。在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是依次出现的,其中“博爱”出现最晚,1789年《人权宣言》没有,1791年宪法只隐晦提及。“自由”关乎人的价值,“平等”涉及社会规则,那么,“博爱”是什么呢?网球场宣誓和爱国教会所宣称的“博爱”不是一回事,前者源于共济会的兄弟之爱,后者强调来自上帝的馈赠。细究起来,在中文约定俗成的翻译里,“博爱”是个大误译。与汉语“博爱”相对应的英文philanthropy、法语philanthropie源于希腊语,这个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

是“爱”，另一个是“人类”，合起来即“人类爱”，而被翻译为汉语“博爱”的法文原文是 *fraternité*，即英语 *fraternity*，意为“友爱”、“兄弟爱”，其词根即拉丁文 *frater*——兄弟。

博爱难，友爱也不易。在鲁昂遭受火刑的巫女 (*sorcière*)——贞德折射了法国内部的分裂与和解。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女儿在完成从奥尔良的城墙下到兰斯大教堂的旅程后，成为“祖国的圣女”——天主教法国与共和主义法国的和解。米歇尔·维诺克 (*Michel Winock*)《贞德》剖析了时空上的漫长和解旅程。贞德曾是时代的象征，在经历了被遗忘或被忽视的 16 世纪、17 世纪和 18 世纪后，有关她的记忆在 19—20 世纪重新活跃起来；贞德曾是地域差异化的象征，15 世纪有关她的记忆仅止于地域、家族，虽然 1429 年法国国王加封贞德家族为贵族，赐姓杜里斯 (*du Lys*)——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贞德曾是党派博弈的符号，在整个 19 世纪，有三种贞德记忆：天主教教徒、爱国者和排他民族主义者。20 世纪的政治家和各党派出于法国人的团结以及作为团结之对立面的党派主张之目的利用贞德。

三

上述论文是《记忆之场》135 篇论文中的 9 个片断，要了解主编诺拉是如何统摄这些片断的，读他写的长篇导言和结语无疑是有益的。

导言《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不好读，诺拉使用了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修辞，将其关于记忆之场的思考包藏其中。如在第一段末尾，“正因为没有了记忆，记忆才被谈起” (*On ne parle tant de mémoire que parce qu'il n'y en a plus*)^⑩，诺拉到底要表达什么呢？通读整篇文章可知，诺拉如是说乃是与其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看法有关的。诺拉强调，在历史加速度消失的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大，二者浑然一体的时代业已终结。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诺拉有多种表述：“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而古旧的社会记忆，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秘密性质，历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中”。*histoire* 在法语中意为经验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诺拉用一组排比区分记忆和

历史的关系：(1) 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历史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题的重构。(2) 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到的与现在的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3) 记忆带有情感色彩，排斥与其自身不容之物；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4) 记忆把回忆置于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回忆驱除出去，让一切去神圣化。(5) 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的；历史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6) 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和事物间相互关系。(7) 记忆是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诺拉把记忆视作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二者是一种不可交合的对立关系。但是，他又自相矛盾地说：“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之焰，业已消融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为了证实上述分辨，诺拉认为在法国出现了两种历史运动，一种是史学史的兴盛，这是历史学者在通过对自身的反省驱逐记忆的纠缠，“历史”成为他所谓的上述历史。把记忆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这为“记忆之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另一场运动本质而言是历史运动，即记忆传统的终结”。伴随记忆传统的终结，记忆之场成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档案、三色旗、图书馆、辞书、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辞典和巴黎公社墙，均成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

诺拉认为，记忆为历史所缠绕 (*la mémoire saisie par l'histoire*)，由此而出现作为记录的记忆、作为义务的记忆以及作为距离的记忆。在欧洲，档案有三大来源：大贵族世家、教会和国家，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档案的价值曾为历史学家所追捧，虽然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人们依旧热衷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口述调查的兴盛。在法国，有三百多个调查队致力于搜集“过去传达给我们的声音”。诺拉认为这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意向？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

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

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题:历史-记忆一体化的终结催生了各种个体化的记忆,每个个体化的记忆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诺拉认为,这种来自记忆责任的需求催生了记忆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是一种新的记忆方式。从此记忆成为私人事务,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

除去作为记录的记忆和作为义务的记忆外,还有第三种变形的作为距离的记忆,这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诺拉指出,在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那里,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回想可以复活过去,对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裂痕,可以表述为“从前”和“以后”,这反映在历史解释中进步和衰退两大主题上。正是因为与历史的距离感,产生出祛除距离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正是这种距离感,在感知方式的转变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被其放弃的民族记忆中的常见之物:记忆之场。

那么,何谓记忆之场呢?诺拉认为它“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如,档案馆是实在的场,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在于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有的标志性特征。在这三个层次上,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存在所指对象不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没有所指对象,它只是个指向自身符号,纯粹的符号。

本来,记忆有历史的和文学的之分,现在彼此边界模糊,伴随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兴起,还有诺拉并不看好的口述史的成功,他宣称历史是失去深刻性时代的深

邃所在,“记忆被置于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之殇”。

《记忆之场》第一部问世后两年,1986年第二部三卷顺利出版。第二部接续第一部所预设的目标,因此,在结语处诺拉仅附上一篇短文《民族与记忆》。第三部三卷1992年出版,距第二部三卷的出版晚了6年,这固然有写作和编辑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发生了令诺拉不得不深思的两个事件:一是长期对垒的东西“冷战”格局瓦解后,民族-国家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另一个是长期拒绝国家/民族叙事的法国史学内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著作,著名的“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在1986年出版了三卷本《法兰西的特性》。^①“记忆之场开始于与这些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激进观点”。^②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而不是对不在之事重构的历史,那么区分与后者的关系便是其所意欲达成的目标。但是,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后,诺拉发现他所生造的“记忆之场”的暧昧性有碍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第3卷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这个概念是狭隘的、限定的概念,集中于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等纪念物,与现实具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场还具有比较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本来,记忆之场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皮,将其条分缕析,但与编者这种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被人们广泛使用,内涵缩小为仅仅指称物质性的纪念场所。诺拉无奈地说:“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

与这种困境相较,《记忆之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困境是,本欲批判和解构以往的法兰西历史叙述,无意中却重构了一个整体的法兰西史。在法国,关于法国史的叙述均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法兰西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或属于历史范畴(日期、人物、事件),或属于地理范畴,或属于政治范畴,或属于经济和社会范畴,或属于物质和制度范畴,或属于精神和意识形态范畴,史家据此建立了多层次的决定论,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

现在,勾连其历史脉络不断的连续性,这体现为三大历史叙述: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及年鉴学派,分别由米什莱、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所代表。米什莱把物质和精神统一为一体,是第一个把法国视作“灵魂和人”的人;拉维斯用科学方法爬梳所有民族的传统;布罗代尔试图建构物质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整体世界。以批判这种传统历史学为出发点的“记忆之场”,蓦然回首,发现自身不知不觉地也构筑了一个基于当下情感的法兰西整体的历史——本来想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后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似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1983年,也即《记忆之场》第一部出版的前一年,法国人早早开始筹备6年后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人们发现,不要说历史学家和普通公民,即使是法兰西的总统们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能否纪念法国大革命”成为一个大问题。革命不再。纪念活动既无法也毋庸唤起人们对革命记忆的激情,结果,“庆祝大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比我们所庆祝的大革命更为重要”。在此,诺拉注意到纪念活动所内含的其他意义,“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中,最受期待的,听众最多的,不是大革命的吹捧者,而是大革命的受害者”。这说明不是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而是当下如何看待历史。更意味深长的是纪念内容的“空洞化”,用诺拉的话,“那些无纪念对象的纪念是最成功的,那些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最空洞的纪念从记忆价值角度看却是最具深意的”,如卡佩王朝建立一千周年纪念、戴高乐年以及城堡旅游等。

纪念的变形表明纪念的目的正从对民族历史的弘扬转为对历史遗产的强调。1981年1月19日《费加罗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显示,1979年12月,只有12%的法国人知道“遗产”指民族艺术财富,而到1980年12月,这一比例达到了36%,法国社会由下而上,由外省到巴黎,逐渐对遗产发生兴趣。诺拉认为,“法国从单一的民族意识过渡到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遗产是与认同、记忆相互关联的近义词。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记忆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以及从有意识到半无意

识的场域;遗产则直接从继承所获财产转向构筑自身的财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记忆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历史就是被验证了的记忆”。试图解构拉维斯《法国史》的诺拉,不自觉地成为一百年后的拉维斯,他似乎意识到这种悖论,最后为这部大著写下了如下一段话:“纪念的时代终将拉上帷幕。记忆的暴政只会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是我们的时代”。

四

“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19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第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诺拉的《记忆之场》唤起了人们重新关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诺拉继承了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与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并将其推向极致,^①所不同的是,对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关系,诺拉持有不同看法,尽管他无奈地承认《记忆之场》重构了法兰西民族史叙事的框架,但在理论上自觉到个体记忆的存在及其作用。此外,恰如德国文化记忆大家阿斯曼(Aleida Assman)所说,诺拉把哈布瓦赫视为时空上存在的结合体——集体,改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②

当人们讨论《记忆之场》给历史学和记忆研究带来了什么的时候,哲学家利科(Paul Ricœur)也加入了讨论,不过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科在《记忆·历史·忘却》中,将诺拉的导言概括为三点:记忆与历史发生断裂,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丧失,出现了新的被历史纠缠的记忆形态。利科认为这些主观看法是“奇怪的(insolites),令人感到不安(inquiétante)”。^③稍后,利科发表德文论文

《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与诺拉导言同名,指出“记忆”和“历史”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记忆是构成历史的母体,历史是从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开始的,因而,记忆得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⑭利科导入的问题涉及与哈布瓦赫截然相反的另一关于历史和记忆关系的看法,在那里,二者关系不是表述为历史与记忆,而是历史即记忆。☞

- ①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XIX. 1997, p. 25.
- ② 本文系为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所写的导读。国内学者对诺拉记忆研究的评介,参见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但在对“记忆之场”研究的内容和背景理解上,本文与该文有很大不同。
- ③ Pierre Nora,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Paris: Julliard, 1961.
- ④ Todd Shepard, *The Invention of Decolonization: The Algerian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Fra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6.
- ⑤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Fai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4.
- ⑥ Pierre Nora,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1,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⑦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 2.
- ⑧ Nation 一般被译作“民族”,其实还有另一层涵义:“国民”。
- ⑨ Pierre Nora,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Realms of Memo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⑩ ピエール・ノラ編《記憶の場: フランス国民意識の文化 = 社会史》,谷川稔监译,(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
- ⑪ 近年诺拉相继出版了若干本著作。分别是自传体《公共历史学家》(*Histoire Public*, Paris: Gallimard, 2011.),讨论历史认识论的《现在、国民、记忆》(*Présent, Nation,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2011.),研究1789年以来法国的记忆和认同问题——“国民”、“共和国”、“革命”——的《法国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 Paris: Gallimard, 2013.)等。

- ⑫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⑬ Pierre Nora, La nation - mém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I, La Nation, Paris: Gallimard, 1986, pp. 647 - 658.
- ⑭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 ⑮ Paul de Man, *Aesthetic Ideolog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33.
- ⑯ Michel de Certeau,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75.
- ⑰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29页。
- ⑱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ire*, I, p. XIX. 1997, p. 25.
- ⑲ 中译本参见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 ⑳ Pierre Nora,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Realms of Memory*, p. xvii.
- ㉑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53.
- ㉒ Aleida Assma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C. H. Beck, 1999, S. 132 - 133.
- ㉓ Paul Ricœ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0, pp. 522 - 523.
- ㉔ Paul Ricœur, “Zwischen 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 *Transit* 22 (Winter 2001/2002), S. 3 - 17.

作者简介:孙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成 婧〕